

本科教材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简编

主编 孙钱章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简编

主编 孙钱章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1993年1月

说 明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是正在逐步形成的新学科。它涉及的时间长、方面广，综合概括难度很大。为了适应教学之需和促进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聘请孙钱章同志组织编写了这本《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简编》。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济管理思想混乱，又鉴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管理思想尚待深入研究，所以，本教材写至1965年。本教材经过多期教学使用，得到教学人员的肯定。1993年初，我们再次请孙钱章等同志，作了一定的修改。尽管如此，本教材还定有不完善之处，希广大学员、教员和学者、专家提出意见。

本书由孙钱章同志组织、设计、统纂定稿并担任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

张锦城、顾兆纯、董春峰、叶华、丁柏传、范士华、孙钱章。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范士华、丁柏传同志协助做了某些修订工作。

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参阅了有关的著作、资料，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1993年1月

目 录

第 一 章	先秦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1
第一节	先秦经济管理思想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	1
第二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规划和决策	5
第三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监督	10
第四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	14
第五节	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	19
第六节	经营管理的方针谋略	24
第 二 章	秦汉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29
第一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决策模式	29
第二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管理组织	36
第三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	41
第四节	经济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46
第五节	经营管理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52
第 三 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5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概况	59
第二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目标与决策	60
第三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管理与监督	63
第四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与控制	65
第五节	经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71
第六节	经济管理的谋划与方法	73
第 四 章	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76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状况	76
第二节	经济管理的战略目标与决策	77
第三节	经济管理的组织与结构	80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调节、控制与监督	83
第五节	经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90
第六节	纸币管理思想	95
第七节	经济管理的谋划和方法	98

第 五 章	近代经济管理思想	101
第一节	概述	101
第二节	近代化、工业化的战略目标	101
第三节	行政干预思想与自由放任思想	103
第四节	关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与控制的思想	104
第五节	近代企业的管理思想	110
第 六 章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	114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14
第二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116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120
第四节	“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125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

先秦,指的是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后来史家用以概括自远古起、迄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阶段。先秦的经济管理思想包括着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萌芽以至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初步形成或奠基阶段。

第一节 先秦经济管理思想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

一、变革争鸣的历史时代

(一) 社会大变革

我国经历夏、商、西周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领主经济逐渐解体,地主经济开始萌芽。其突出表现是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就是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此外,齐、楚、郑、秦等国也都有类似的做法,这表明各国实际上已放弃了井田制度,实行了土地私有制。

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它们互相兼并,以图实现一统天下,这就必须不断加强本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因此,各国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进行改革、变法,从而出现了各国的变法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二)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引起了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各自的见解或主张。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家各派,史称“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商、杂等家。真可谓之“群星灿烂”的伟大时代。

(三) 各种经济管理思想的产生

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各种经济管理思想应运而生。比较突出的有管仲和《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孟儒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墨子墨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商韩法家的经济

管理思想,儒法相济的荀子的经济管理思想,以及范蠡、白圭的经济管理思想,等等。这些经济管理思想,都是变革争鸣的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变革争鸣的历史时代,就成为先秦各种经济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或时代条件。

二、人本主义的理论前提

人本主义或人本论,是先秦经济管理思想首要的理论前提。任何管理的实质都是对人的管理。因此,对人、对人性或人的本质进行探究,是一切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或理论前提。

(一) 人本思想

西周太师姜尚(生卒年不详)最早提出了人本思想。他说:“庶民者,国之本。”^①“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②“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③就是说,在姜尚看来,人为国本,能否“得人”“得心”关系到国家存亡。

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前551年—前479年)也很重视人本思想。他强调“天道远,人道迩”^④“仁者人也”^⑤,仁者“爱人”。提倡“爱民”、“养民”、“惠民”、“裕民”等等。就是说,人是最根本的,在人的管理上,必须施以“仁”、“爱”。

战国中期思想家孟轲(前389年—前305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⑥的思想。他强调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其民者失天下”^⑦。就是说,民为天下本,只有“得民”“得心”者,才能得天下。

《管子》(托名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著)认为从古到今所有统治者的成败都取决于“得人”或者“失人”。并强调政之兴废在于民心顺逆。可见其“得人”和“顺民心”的极端重要性。

战国末思想家荀况(约前310年—前238年)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辩也”^⑧。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意识,能思维,具有特殊能动性,所以才能“制天命而用之”^⑨,才“最为天下贵”^⑩。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的重视,认为人为天下社稷之本,当然也是管理之本。

(二) 人性思想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⑪。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性善则是人为的。人性之所以为恶,就在于人之“有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数量界限,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⑫。因此荀子主张要“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⑬就是说,要使人的欲望和物资两者在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的性恶论,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X理论”或“经济人”理论。荀子主张性恶论,所以认为其管理原则是“导欲”、“节求”、“明

①②③《三略·上略》。

④《左传·昭公十八年》。

⑤《礼记·中庸》。

⑥《孟子·尽心下》。

⑦《孟子·离娄上》。

⑧《荀子·非相》。

⑨《荀子·天论》。

⑩《荀子·王制》。

⑪《荀子·性恶》。

⑫⑬《荀子·礼论》。

分”、“赏罚”。

在先秦思想家中，商鞅和韩非也是主张性恶论的，都把人看作是本质上的“经济人”。因此，在管理上都强调用富贵名利去刺激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强调重赏重罚，以实现其管理目标。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之善也，如水之下也”^①。就是说，人之性善，人性向善，如同水的本性向下一样是自然而必然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强调其管理原则应施“仁政”。孟子这种性善论有点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Y理论”。

《管子》认为，应从不同角度对人性进行分析。它首先指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②。就是说，人的需要首先是衣食足，其次是知荣辱，再次是知礼节。这有点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需要层次论的思想。其次，《管子》强调多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③。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后，就会拥护统治者，甚至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就叫做“予之为取”。因此强调其管理原则是“得人之道，莫如利之”^④。做到“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这些思想，有点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超Y理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对人性的研究有多么类似或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把人性的研究作为管理科学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

（三）人和思想

正因为人有“性”之善恶，有“欲”之求争，所以古代思想家们特别重视“人和”的思想。

孔子最先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荀子认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⑤。就是说，荀子把天时，地利，人和看得同样重要。孟子则从三者中进一步强调人和的重要。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所以重要，荀子对此有所分析：“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⑥。就是说，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团结统一，团结统一就会坚强有力，坚强有力就能战胜万物。

日本人也十分重视人和，认为“人和”和“气顺”是成功的关键。日本企业里到处宣传人和为贵，人和是个宝，只有人和，企业才能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人也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日本管理经验的研究。事实证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人和”了，“气顺”了，就必然“力强”。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所以管理科学必须对之加以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本、人性、人和思想的探究，较多地从一般的人的自然本性上进行探究，几乎没有涉及人的社会阶级性，这当然是一种缺陷。但从管理的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任何管理，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对人的管理，而对本、人性、人和的任何探讨，不能不说是管理理论的深层次的探讨。

①《孟子·告子上》。

②③《管子·牧民》。

④《管子·五辅》。

⑤《荀子·王霸》。

⑥《荀子·王制》。

三、义利、功利的理论前提

义利、功利关系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又一重要的理论前提。

义与利的关系，就是伦理道德和经济利益的关系，也就是二者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系。即所谓“义利论”。有一部分先秦诸子根本不承认伦理道德（义）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功利论”。

（一）义利协调论

在《周易》中，把义和利看作是协调统一的。“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就是说，利与义必须和谐，义必须以利表现，这样，才能达到“以美利利天下”的最高境界。姜尚也认为义利是协调统一的。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①。就是说，只有做到仁义利道协调统一，才能“天下归之”，“治国安家”。

（二）以义制利论

这是儒家的基本义利观。孔子提出“罕言利”^②。在义利关系上，他认为必须强调义，义是第一位的。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必须通过义取得，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③。强调“以义制利”，“义以生利”，“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就是要在义的前提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④，在义的前提下去求个人的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⑤。

孟子把孔子的义利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反复宣扬“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⑥。尽管事实上孟子并不轻视经济问题，而且还提出不少杰出的经济见解。但他上述的义利思想给后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荀子恢复了义利的统一，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义利观。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⑦，不可缺一。而且强调利是生来就有的，义是后天形成的。但他同时又提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可见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基本义利观的影响。

（三）义利一体论

墨家主张义利一体论，而在义利一体中，认为利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义即是利。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年—前376年）明确指出：“义，利也”^⑧。墨子认为“利”是相互的，利民即利国，利人即利己，因此，他特别强调“兼相爱”，“交相利”^⑨，反对“亏人自利”^⑩。强调统治者要“爱利万民”^⑪，“兴天下之利”^⑫。这样，才能“富国家，众人民……安社稷”^⑬。

① 《三略·上略》。

② 《论语·子罕》。

③ 《论语·里仁》。

④ 《论语·尧曰》。

⑤ 《论语·述而》。

⑥ 《孟子·梁惠五上》。

⑦ 《荀子·大略》。

⑧ 《墨子·经攻》。

⑨ 《墨子·兼爱攻》。

⑩ 《墨子·非攻》。

⑪ 《墨子·尚贤中》。

⑫ 《墨子·兼爱下》。

⑬ 《墨子·耕柱》。

(四)“自利”决定论

“自利”决定论,即法家主张的功利决定论,根本否定仁义的作用,认为只有功利(自利)是决定一切的。

商鞅把人看成都是自利的,认为每个人都是“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①为了求利,不怕犯法身危,为了求名,不怕困苦劳伤。而这种求名求利思想,不进棺材是不会罢休的。“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②。

韩非则更进一步论证了“自利”是决定一切的,他认为人人都有“自为心”和“计算之心”(即自利心),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③。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是出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的计算之心^④。医生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乃利之所加也。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因为这样买车子的人就多。做棺材的人希望别人短命,因为这样买棺材的人就多。这并不是做车子的人心好,做棺材的人心坏,而是自利决定的。一句话,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自利决定的,都是自利的交换关系。这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

《管子》也是主张“自利”决定论的。认为人都为利所驱使,“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⑤。

很清楚,法家把“自利”看作是推行“法治”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强大的动力,把功利主义视为治国的至宝。

上述这些义利、功利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以至中外现代管理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规划和决策

一、系统整体的经济管理规划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必须从系统整体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其管理。即所谓战略管理。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有许多是从系统整体的高度探讨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战略规划问题。

(一)《孙子》中的战略规划思想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是世界公认的军事战略著作。许多国家都在研究把《孙

①《商君书·称地》。

②《商君书·赏刑》。

③《韩非子·难一》。

④《韩非子·六反》。

⑤《管子·禁藏》。

子》的军事战略管理思想运用于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之中，而且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效。

《孙子》全书是侧重论述战略问题的。首篇为“计篇”，集中地论述了战略计划的重要性。“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经济管理，同样要以计为首。《孙子》在计篇中，要求人们从“五事”、“七计”对战争进行全面的运筹计划。“五事”者：道、天、地、将、法。“七计”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五事”“七计”不仅要“己”方进行分析，而且要从“彼”方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二）《周礼》中系统管理规划的思想

《周礼》是我国最早论及国家管理的专著。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行政、土地、人口、财政、市场、手工业、资源、交通、工程、军事、司法、教育和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真可谓古代管理的“大全”。

《周礼》对封建国家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规定，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为六篇，每篇以专章论列全体职守及级位员额，并一一规定每种职守的主管事务、办事章程及考核制度。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既是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系统。

《周礼》中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地官司徒》部分，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的管理，人口和劳动力的管理，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以及备荒救灾的管理等几个方面。（略）

从以上这些管理制度和规定，可以看出：《周礼》中已经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系统整体来加以规划和设计了。

（三）荀子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构想

荀子吸收了儒、法、墨各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构想。

荀子强调管理国民经济必须是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从根本上实现“富国裕民”、“上下俱富”的目标。

荀子强调要管理好国民经济，必须处理好国民经济中各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有富国和富民的关系，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农业和工商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在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上，荀子提出三个方面，一是“明分”，即确定社会分工和等级地位；二是赋役，即轻徭薄赋，并以此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三是适时，强调各项生产活动必须按农时季节进行，注意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从以上荀子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管理环节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荀子是从国民经济的系统整体提出其管理构想的。因此，荀子的富国之学就成了先秦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典型。

（四）《管子》的经济规划思想

《管子》是先秦古籍中经济管理思想最丰富的。它不仅对各行业的管理，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对财政货币的管理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论证了国民经济规划和国情调查的重要性。

《山国轨》篇中提出：“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

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这里的“轨”就是经济规划的意思，“轨数”就是进行经济规划所必须的基本数据。强调必须在掌握田地、人口、谷物、货币以及社会需求等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规划方案。不仅强调要有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划及基本数据，而且强调在此基础上制定整个国家的总体规划（即“泰轨”），然后以“国轨”的形式，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不若此，则不可为国。

要制定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必须对国情进行调查和考察。《八观》篇提出对国势进行八个方面的考察，即农业生产，林副业生产，城邑建筑同社会风貌，国力，教化，掌权人物，法治、外交及前景等。通过各方面的考察，掌握基本国情，就能为制定整个国民经济规划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二、富国富民的经济管理目标

先秦诸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大多是从经世济民的高度来探讨如何去达到富国富民的经济管理目标，但对于富国和富民的关系以及如何富国富民，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一）人君必从事于富

这是姜尚提出的富国富民思想。他主张按照大农、大工、大商来组织经济，就会使农工商“各得其所”，尽力从事他们的事业，就能够富国富民。姜尚还提出“务农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匿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就会“国富而家娱”^①。

姜尚认为“富”为一切之本。“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所以“人君必从事于富”^②。

（二）富国必先富民

孔子主张富国必先富民，富民为富国的基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③。孟子则只强调富民，反对富国。

荀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证富国富民的思想家。他强调“富国裕民”，“上下俱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认为富国的根本在于增加整个社会财富。批评那种片面着眼于增加国库收入的富国观点，认为如果社会财富没有增长，百姓穷困，而统治者一味用搜括民财的办法增加国库收入，就不但达不到富国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百姓不满和反抗，以致造成“倾复灭亡”的后果。这样的“富国”，实际上不过是“求富而丧其国”。因此，“故明主必谨养其和……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④。

《管子》更强调“富民”经济。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⑤。可见《管子》把能否“富民”看作是国家安危、兴衰、治乱的根本。

（三）富国不必富民

① 《三略·上略》。

② 《文韬·守土篇》。

③ 《论语·颜渊》。

④ 《荀子·富国篇》。

⑤ 《管子·治国》。

这是法家的基本思想。商鞅很强调富国。认为富国、强国和治国三者是一致的。但为了使国富、国强，就必须使民贫、民弱。他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①。因为“民……弱则官尊，贫则重赏”^②。只有使民弱民贫，才能使民重刑重赏，才愿从事农战，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韩非继承了商鞅耕战富国的思想。其基本思想倾向也是富国不必富民，富国必须抑民。他特别强调“公利”（封建国家利益），反对私利（即“私便”，“私行”“私誉”）。认为只有在保证公利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给臣民一点富贵利禄。如果“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③。总之，韩非认为只有重公利，抑私行，才能实现富国强兵。

三、农本工商末的管理指导方针

在先秦诸子中几乎都把“农本工商末”作为其经济管理指导方针，但在展开这一思想时，又各有其不同。

（一）重农抑商禁末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政策”是其重农思想的突出表现，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因此必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为重农本，就必须“禁技巧。”“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④。

商鞅特别强调农本，认为农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凡将立国”，“事本不可不专（专）”^⑤，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⑥。商鞅还把农、战结合起来，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⑦。

为了突出农本和推行农战政策，商鞅主张抑商禁末，认为“农少商多”就会使国家“必削”。因而“能事本禁末者，富”^⑧。如果能使商贾技巧之人减少，“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⑨。

（二）壹民务本，重视工商

《管子》在多方面论述农业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君国的统治者要“壹民”务本，认为“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的国家是很危险的^⑩。强调统治者要“为民兴利除害”，“兴利者，利农事也……除害者，禁害农事也”^⑪。

《管子》对工商业的作用也是肯定的。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都是“国之石民也”^⑫。指出手工业（百工）可使“毋乏耕织之器”^⑬。商业则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⑭。《管子》虽认为工商有其重要作用，但与农业相比不能不占次要地位，因而主张工商业不能过分发展，应降低百工商贾的社会地位。

①②《商君书·弱民》。

③《韩非子·八说》。

④《说苑·反质》。

⑤⑧《商君书·壹言》。

⑥《商君书·错法》。

⑦《商君书·农战》。

⑨《商君书·外内》。

⑩《管子·权修》。

⑪《管子·治国》。

⑫⑬《管子·小匡》。

⑭《管子·幼官》。

荀子关于农工商的基本思想与《管子》相近,荀子认为富国必从“强本始”,因而提出“众农夫”、修水利、因地制宜,保护生态、不失农时,罕举力役和轻田野之税等七条加强农本的措施。

荀子认为发展工商业能为农本服务。只有发展手工业,才能使“农夫……足械用”,“百工以巧尽器械”^①。“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②。商业能够“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而足菽粟”,使“天之所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③。因此,荀子主张对工商业政策上应予便利。但工商业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工商人口过多,则不利于农本富国。

(三) 农本工商末

这是韩非的重要思想。韩非认为农为富国之本。“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因此,“有道之君”,“其治人事也务本”^④。为了突出“农本”,韩非全部继承了商鞅的农战富国强兵的思想,提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⑤，“能越（趋）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⑥。

韩非也承认工商业有增加财富的作用,但与农“本”相比,不能不居“末”等地位。因此他提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舍）本务而外末作”^⑦。韩非第一次把“农本”与“工商末”联到一起,即第一次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农本工商末”的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对后世的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四、强本节用的经济管理原则

强本节用的关系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强本是指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节用是指反对奢侈,节制消费。先秦思想家多把强本节用看作重要的经济管理原则。

(一) 政在节财

孔子强调“政在节财”^⑧。并把“财”和“人”联系起来,强调以“人”“守位”,以“财”聚人。认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就是说,“财”是“聚人”治国的基础。《大学》还进一步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一思想成了后世治国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 固本用财

墨子提出了“生财密”,“用之节”^⑨的重要经济管理原则,即把生财和节用联系起来考虑。强调“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⑩。墨子首先强调固本重财,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其办法:一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二是提高劳动强度,即“强从事”或“强力疾作”。墨子同时强调整节用,主张把生产奢侈品的劳力用于生产一般的生活用品。这

① 《荀子·荣辱》。

② 《荀子·王霸》。

③ 《荀子·王制》。

④ 《韩非子·解老》。

⑤⑥ 《韩非子·五蠹》。

⑦ 《韩非子·心度》。

⑧ 《礼记·中庸》。

⑨⑩ 《墨子·七患》。

是墨子节用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只有把生财和节用结合起来,才能使“民富国治”。

(三) 强本节用

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①。就是说,人的贫富,不是靠天,而是靠能否强本节用。荀子认为只要人们“务本”、“节用”、“善治”,财富会源源而来,即所谓“务本节用财务极”。荀子提倡节用,但不是禁欲主义,而是要“节用以礼”,使消费保持在合理(礼)的水平上,同时强调消费程度要由生产来决定,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四) 侈靡消费观

这是《管子》的独到见解。在生产方面,它强调通过劳动增殖社会财富,强调劳动和土地的结合是财富的源泉。在消费方面,既主张一般情况下的崇俭,又鼓励特殊情况下的侈靡。所谓特殊情况下的侈靡,一是指“兴时化(货)之时”,即产品积压阻碍再生产进行时,用扩大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此时“不奢,本事不得立”^②。二是指“若凶旱水洧,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③。三是在富人富埒王侯之时,也要提倡富人侈靡。使其财力不致于膨胀到与国君分庭抗礼难以驾驭的地步。当然《管子》也看到侈靡的局限性,指出“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④。

以上思想家们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论述,尽管有其维护阶级统治等局限性,但提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要保持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思想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监督

一、社会分工的组织理论

社会分工既是组织管理的基础,又是其重要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由“自发地”进行,逐步发展为自觉地进行,并产生了社会分工的组织理论。

(一) 社会职业分工论

我国西周初年,开始出现社会分工的原始理论。姜尚提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完,则国安”^⑤。他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农、工、商三大领域,符合人类社会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后经济结构状况,这是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来源,只要三种经济完善发展,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因而谓之“三宝”。

管仲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按社会职业划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打破了过去严格按阶级、等级来区分不同社会集团的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直到本世纪初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一直延用的社会集团典型分类方法。

孟轲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理解。他从人们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和人的精力的有限性两个方面绝妙地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且一人身而百工之所为备。

① 《荀子·天论》。

② 《管子·侈靡》。

③ 《荀子·乘马》。

④ 《管子·事语》。

⑤ 《六韬·文韬·六守篇》。

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①。不仅如此，他对社会分工的好处也有较透彻的认识。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②。由此可见，孟轲对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有了比前人更深刻的认识，是古代论述这一问题的卓越见解。

荀况从“明分”思想出发，对社会分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首先，从社会发展和人的能力有限出发，提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③。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必须建立在“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职业分工和等级身份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以取得战胜自然的力量。“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④即由于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工作，精通一种技能，就象“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⑤一样。因而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⑥其次，对社会分工的益处有了深入的认识。“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序四时，栽万物，兼利天下。”^⑦再次，提出分工专业化才能提高技艺。“习其事而固”^⑧，“好稼者众也，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也，而夔独传者，壹也。……自古至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⑨

韩非认为只有分工专业化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他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⑩他对“功”作过解释：“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⑪即投入少而产出多。这只有分工专业化、固定化才能做到。否则，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二）劳心劳力分工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⑫

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为了把压迫、剥削奴隶的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劳心劳力的分工理论。他们把从事管理的统治阶级称为“君子”，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称为“小人”。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社会分工是“先王之制”^⑬。并把“君子”的劳心活动说成是上天安排的“利民”活动，宣扬“天生民而树其君”^⑭，因而要求“小人农力以事其上”^⑮。

孔丘把历史上劳心劳力的分工理论引向更加错误的极端。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⑯因而造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危害甚大。

墨子认为，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⑰，强调劳动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他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孟子·滕文公下》。

③⑦《荀子·王制》。

④《荀子·富国》。

⑤⑧《荀子·道君》。

⑥《荀子·王霸》。

⑨《荀子·解被》。

⑩⑪《韩非子·解老》。

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⑬《左传·襄公九年》。

⑭《左传·文公十三年》。

⑮《左传·襄公十三年》。

⑯《论语·卫灵公》。

⑰《墨子·非乐上》。

把“力”分为“君子”的“强听治”，“亶其思虑之智”的“力”和“贱人”的“强从事”的“力”。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语言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理论。

孟轲论证了劳心劳力分工的必要性。他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①这段话对劳心劳力的分工作了充分的理论论证，是孟轲对脑体劳动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却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行为作了辩护。

荀况把脑力劳动看作是组织生产的必要职能。他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②荀况的见解是深刻的，但也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

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

（一）以家族为基础分业定居组织生产

西周初年，姜尚提出：“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③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同业人员聚居一乡，形成区域经济；二是以家族组织作为区域经济的生产单位。

管仲提出四民分业集中聚居在固定地区的主张。他说：“定四民之居”，“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④。他认为分业定居对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有四大好处：第一，便于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第二，业务信息流通，有利商品生产和流通。“相语以利，相示以利，相陈以知价”；第三，专业气氛浓厚，安居本业，稳定生产劳动力。“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第四，造成良好的技术教育环境，有利实行职业世袭制。“少而习之”，“不肃而成”，“不学而能”。从而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职业世袭制。同时也可避免四民杂居的坏处。“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咙，其事易”^⑤

（二）按各业比例关系组织生产

管仲认为各业应按一定比例关系组织生产。他提出“参其国而伍其鄙”^⑥的主张。“参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士、工、商三部分，共 21 乡，其中士乡 15，工商之乡各 3。“伍其鄙”就是将田野划分为 5 属，每属 9 万户，都是农业人口。按管仲的国鄙编制推算，当时齐国共 49.2 万家，其中士 3 万家，农 45 万家，工、商各 6000 家，化为百分比，士约占 6.1%，农约占 91.5%，工、商各约占 1.2%。这个比例数字说明，农业为主，工商为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墨翟提出各业劳力安排的一个总原则。即“天下群百工……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

①《孟子·滕文公上》。

②《荀子·富国》。

③《六韬·文韬·六守篇》。

④⑤⑥《国语·齐语》。